

中国篆书书法对日本的影响与普及

——以城户桓《书谭》为中心

曹

悦*

The Influ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Seal Script Calligraphy on Seal Script in Japan

—— Focusing on the Syotann of Kido Kann

CAO Yue

Chinese seal script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After Qin Shihuang unified the script, the position of the seal script gradually declined because of the scripts' evolution and the demand for practicability. But in the Ta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two large seal script renaissances, whose influence restored the importance of seal script. The Qing dynasty was another peak in the seal script renaissanc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it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Qing dynasty's Chinese seal script, but also the seal script of Edo Japan.

As for the research that has been done on my topic, so far there is just one person who has written about it, Iwatsubo Mitsuo. He mainly arranged and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seal script publications in the Edo period, and did not talk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seal script on Edo Japan. In this thesis, first I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al script and the examples of famous calligraphers' theories, then I introduced Kido Kann, the obscure calligrapher and his theory. So that we can see the influ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seal script in Edo Japan.

キーワード：中国篆書書法 江戸日本 城戸桓 書譚 展開

一、前言

中国篆书书法发展源远流长，自殷商至秦，形成了以篆书为书写字体的时代。汉代以后，随著文字演变和实用性的需求，篆书的地位日渐衰落，但在唐代、清代分别进行了两次大的篆书复兴思潮，使得篆书逐步恢复其影响力。延至清代，随着金石学，碑学的开展，篆书的创作达到极盛状态。

清代是继唐代之后篆书复兴的又一个高峰，在当时著名的碑学运动中，篆书的复兴也是其兴起和提出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出现了一大批与篆书相关的书家和学者，其中一部分书家继承了传统篆书，一

* 曹悦：关西大学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文化交涉学专攻

部分书家如孙星衍、王澐等结合其学者身份以及特殊的文化修养，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的独特的篆书风格。清代在复古的基础上又为篆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当时的中国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书法也产生了影响。¹⁾

江户时代的日本随着频繁的海上贸易，诸多文化得以深入交流，中国书法便是其中主要一项，这直接促生了江户时代的唐样书法。在江户时代以前，楷书、行书风靡，而篆书却鲜有人知。应当说篆书在江户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使得日本书家对中国篆书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学习。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与篆书相关书法理论，既有泽田东江、松下乌石等名人的书论，也有像城户桓等这样的知名度很低、历史记载很少的书家的书论，这些书论很多来源于中国古代书论，由此可以分析出江户时代这些书论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资料及其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便可以了解江户日本对中国篆书书法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岩坪充雄²⁾已有类似论题的研究成果，他主要整理和讨论的是江户时代与篆书相关的出版刊物的问题，而对中国篆书所带来的影响涉及较少，同时在本人之前的文章当中，已经谈过有关一些有名书家的书论所受到的中国书法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城户桓为中心，探讨在江户时代，一些下层且没有名气的书家对于中国篆书书法的接受情况。

二、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时代日本的接受情况

1、中国篆书书法的发展

甲骨文发掘于殷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已经成熟的文字体系，在原始宗教活动丰富的殷商时期，甲骨文字基本都用于占卜、祭祀，为了敬事鬼神，契刻的居多，有少数为书写而成，象形意味较浓厚。商代末年，文字逐渐题刻在器皿上，形式庄重，慢慢摆脱原有的装饰性，赋予更多人文意义。

西周早期，金文逐渐流行起来，依然有装饰的意味，书写较随意，且风格迥异，但随着礼乐制度深入人心，相比之前的金文，有明显的秩序感，书写流畅，线条优美，字形以及章法排布都有一定的规律，开始遵循法度，降低了象形的程度，加入更多人的思想，人工美日益突出，从无序到有序不断发展，大篆逐渐有了规范，如《墙盘》等代表作品。与此同时，受潦草书写的影响，简化了“篆引”，形成介于正体大篆和草体之间的新的风格，代表作品有《散盘》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但是使得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早期延续西周大篆的风格，各诸侯国之间大同小异，到中期以后，楚国等一些诸侯国开始美化装饰大篆，出现“虫书”、“蝌蚪书”等，而黄河流域直到战国中期，一直新旧并存，还有诸侯国在延续传统大篆的基础上加入草体，字的结体不再规范，更加注重线条变换流畅等新的审美需求，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大篆。春秋时期的秦国，文字与书法自成体系，作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图案化较强的《秦公钟》、《秦公簋》为代表的金文作品，另一种是以《石鼓文》为代表的图案化程度更高的文字，战国以后，逐渐向小篆过渡。

1)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日本——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东亚海洋共同体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主办，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承办，2015年12月，第22-39页。

2) 岩坪充雄，江戸時代の篆書体受容について—篆書関連書籍の翻刻・出版の事情より，《書学書道研究》(15)，2005年，55-69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施行“书同文字”的政策，废除六国异文，认为小篆为李斯所改定，足可见李斯在秦代，乃至篆书发展史上都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省改小篆，使得篆书的发展告别了古文字，成为文字演变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秦之后篆书不断简化、省改，经历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书体演变至魏晋基本稳定，各种书体的意义也基本约定俗成，楷书的正体地位牢不可撼，遂至篆隶逐渐退出实用舞台，几近中废，到唐代得以复兴。唐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繁荣的朝代，加上统治者开明的政策和对书法的喜爱，各书体都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中逐渐退出实用领域的篆书也在复古的大旗之下重新发展起来，李阳冰雄秀独出，以“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魄力将篆书的魅力做了新的阐发，他的成绩对于唐代成为书法全面发展的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明代初期，文化的发展单纯的知识为了粉饰太平，书法的发展当然也得到了禁锢，明代中叶逐渐出现了吴门书派，晚明时期浪漫主义书风才彻底扭转了文化高压的局面，个性解放，大多数书家通过行书、草书来抒情达意，而篆书并没有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在当时不适宜区抒发文人的情感，在篆书的发展中并无益处。

清代是篆书复兴的又一个高峰期，在当时著名的碑学运动中，篆书的复兴也是其兴起和提出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出现了一大批与篆书相关的书家和学者。王澐、钱坫、孙星衍等人，由于学者的身份和特殊的文化修养，“以古为师”，遵从古法，学习李斯、阳冰等先人的篆法，并从碑版中习得篆书精髓，由于对古代碑版的严格遵守以及深厚的字学基础，也使得王澐等书家篆书风格较为古板，多为古人的影子，自我创新较少，但尽管如此，对古法严谨的要求规范了时下混乱的篆书风格，对篆书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规范。

清代中期，篆书的地位得到重新确立，受古法的影响，篆书的发展日益规范化，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受到当时多种思想的冲击，如碑学思想、民族怀旧思想、外来艺术思想等，书家的创作不再拘于传统，更加关注艺术性，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结合碑学兴盛的背景，加入清人自己的想法，形成清代篆书独有的风格，包括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吴昌硕等书家，基本都遵循这种体势偏长或偏方、追求线条质量和流畅性的特点，具有较强的书写意味。清篆在篆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后人学习篆书的楷模和范本。³⁾

总而言之，篆书从李阳冰的复兴直到明清，一直在不断变化发展，明清时期已经是书法走向成熟的时期，各种体系基本完备，尽管“以古为师”，但有了自己的特点和规范，此时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创新，同时融入了很强的书写意趣，突破了前代单一的用笔，使得篆书作品秀美端庄但不失圆滑，结构多上紧下松，用笔节奏感极强，而且在苍劲有力的用笔中，圆润灵动的气息酣畅淋漓的展现出来，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具有创新性的篆书风格。⁴⁾

3) 曹悦，清代篆书的日本影响，《近代东亚海域交流：航运、台湾、渔业》，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3月，第57-75页。

4) 曹悦，唐代书家李阳冰篆书书法的复兴及其影响，《或问》，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2015年第28期，第169-176页。

2、江戸日本对中国篆书的接受情况

清代篆书复兴思潮使得篆书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同时期的江戸日本也受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松下乌石和泽田东江这两位较为有名的书家为例进行分析。

松下乌石，名辰，字君岳、神力、龙仲等，号乌石，生于元禄十一年（1698年），卒于安永八年（1779年），是江戸时期著名的书家，多习得中国书法，是中国书法在日本传播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

松下乌石撰有《书法群碎》，成书于元文四年（1739年），全文共225字，文后有河保寿题跋曰：“乌石先生成编也，名之曰书法群碎，古人书法与其原委，论而定之，靡有不悉得其要领者，大抵闻里师，知有今而不知有古，知有正而不知有奇，则至使效之者，愈益浴渴不可观焉，何其拙也，若得其人以作书，则舍此以哉，是编所以成也。”⁵⁾ 题跋者认为，今人学书有的只知今而不知有古，无法得到书法真正的精髓，而松下乌石这篇文章，叙述古人书法及其原委，弥补今人学习的不足，为学习传统书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文章主要叙述了学书法、撮笔法、五指法、三腕法，运笔法、大书法、中书法、小书法、结体法、写字法这几部分内容，在之后的总论部分提及小篆，内容如下：

张怀瓘曰：小篆秦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陶九成曰：小篆俗皆喜长大，长而无法，但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脚不过三，有无可奈何者，当以正脚为主，收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无脚字，如生甘之等字，却以上枝为出，如草木之为物。吾丘衍曰：学篆字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则其欸识中古字，神气敦扑，可以助技。又曰：今之篆书，即古人正常字，中古初有笔也，不过竹上束毛，便于写画，故篆字肥瘦，抱一转折，无棱角，后人以真行草，或细或肥，以为美茂，若笔无心，不可成体，今人以笔作篆，遂不及古人矣，若以笔作之，于灯上烧过，庶几为便乎。⁶⁾

文中提及张怀瓘、陶宗仪和吾丘衍三人，分别引用了其书论的内容，且基本上是对这些中国古代书论的整理，通过将以上内容进行分析，查处其中有关篆书的书论内容在中国文献中的出处，通过这些出处进一步究其版本的出版情况，然后对应唐船持渡书，找出在当时可能看到的书籍有《百川学海》和《读书敏求记本》，而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百川学海》中同时收录了张怀瓘的《书断》和陶宗仪的《书史会要》，而张、陶二人的书论内容在松下乌石的文章中被节录整理，如表1，符合《书法群碎》成书并输入日本的时间为宝永七年（1710年），因此在当时《百川学海》这部丛书被参考的可能性很大，而其中《书断》和《书史会要》的内容对松下乌石撰写《书法群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0页。

6)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68页。

表1 《百川学海》输入日本的时间一览

版本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百川学海本》	宝永七年	1710
	宽延四年	1751
	宝历四年	1754
	宝历七年	1780
	天明二年	1782
	嘉永六年	1853

另一位书家为泽田东江，生于享保17年（1732），卒于宽政8年6月15日（1796年7月19日），是江户时代著名的书道家、汉学者、儒学家，著有《书话》一文，《篆说》是其中与篆书相关的一篇文章，对篆书的起源、流传、种别进行叙述，文章内容用篆书书写，最后刻有楷书释文，及芝田汶岭题跋。全文共418字，在《日本书论集成》中，北川博邦对此进行题解⁷⁾，提到此文与《说文解字叙》内容相似，只有结论部分有所改动。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自黄帝以来，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间，中国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洎宣王史，《史籀》采仓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文。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谓之小篆。自而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六体，曰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其别出者，若麒麟、鸾凤、龟龙、鱼、雕虫、钟鼎、璿珞、偃波、芝英、柳叶、悬针、垂露、蛇蚕、云穗、仙篆、鹤书，此皆有名而不传其制，偶有所见者，亦惟妄作耳。夫周室既东，不同文也久矣，虽秦同文字，然其得上古已有之，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损益撰集，自我作古，古文、大、小篆，名则三，实则小异而大同，古文谓之蝌蚪，史书谓之大篆，秦篆谓之玉筋篆，皆当时之异，称岂复伪造以行怪哉，故余谓学篆书则以李斯、阳冰为法，为是故也。⁸⁾

以上是泽田东江《篆说》的全部内容，文章前半部分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出处，然而后一部分则没有相对应的中国文献，是东江个人对于篆书的思考和见解。

北川博邦提到的《说文解字叙》，又作《说文解字序》，作者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东汉时期汝南郡召陵县（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用二十年之久撰写了《说文解字》，这篇序，既是对《说文解字》的概述，同时对文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叙的内容篇幅较长，首先简述了周代以前的文字的流程，接着介绍了自周代到秦的文字的演变，然后介绍了汉以后文字的概况及其研究，并指出尊崇隶书反对古文的错误，最后说明作书的态度、意义和体例。

将东江先生的《篆说》与许慎《说文解字叙》的全文一一进行比对后发现，《篆说》内容并非完全是对

7) 西川宁编，北川博邦题解，《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2-3页。

8)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31-49页。

《说文解字叙》的复述或抄袭，文章前半部分有一些语句与《说文解字叙》完全重合，但不是完全来源于《说文解字叙》，可能对其他一些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相关书籍进行参考并撰文，因此，对《篆说》全文内容逐句翻查，究其出处，其中，有一半的内容可以在一些书目中找到原文相对应，剩余的一半内容则没有找到出处，应该是泽田东江个人对于篆书的看法和理解。

如表2中所罗列的书目为泽田东江在《篆说》中可能会看到的书目的版本，通过参考这些丛书中的《说文解字叙》、《增广钟鼎韵序》、《论书表》、《书旨述》、《四体书势》和《汉书·艺文志》这六部书，整理出《篆说》的前半部分内容，结合其个人的想法，完成文章的后半部分，形成了较全面的篆书书论内容，为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表2 《篆说》可能参考的舶入日本的中国书目汇总

序号	书名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说文解字》	正德四年	1714
		享保十二年	1727
2	《性理大全书》	宝永七庚寅年	1710
		享保四亥年	1719
		享保十年乙巳	1725
		宝历四年	1754
3	《法书要录》	明和二年	1765
4	《墨池编》	宝历九年	1759
5	《佩文斋书画谱》	享保十年	1725
6	《寄园寄所寄》	宽延二年	1749
		宝历九年	1759

以上这两篇书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江户时代，一些名人书家对于篆书书法的认识，以及对对中国篆书书法的接受情况，而且可以看出，在早期如松下乌石等人的书论，基本上是对中国古代书论的摘抄和整理，到了后期如泽田东江等人则在整理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想法和理解，足可见中国篆书在江户日本不断发展普及，逐渐由对传入知识的学习上升为理解并加入自己的观点。除了一些有名的书家之外，还有一些不知名并且记载很少的学书者如城户桓等也撰有书论，其内容涉猎广泛，基本上都是个人对于书法的认识，在下一节中展开分析城户桓的书论《书谭》，由此来看在江户日本对中国篆书书法接受的人群及其接受情况。

三、城户桓与《书谭》

1、城户桓及《书谭》的分析

城户桓，初名为广文，字仲华，祖上世代代在丰前小仓侯任职，后来隐居到企救郡蒲生村，专攻书法，最擅长草书和楷书，晚年居住在京都天龙寺之后，改名桓，字亭一，号南华。生于正德二年（1712年），卒于天明八年（1788年）二月，享年七十七岁。

历史上对于城户桓的记载较少，传世的书法作品也几乎没有，相比于同时代的书法家略显逊色，没有

的到时代相应的重视，但在西川宁编撰的《日本书论集成》⁹⁾中收录了城户桓的一篇书论《书谭》，全文一共有三十七条，如表3所示，叙述了有关书体、书法、书品、文房用品等一系列内容，通过对各段进行统计，这三十七条书论当中，文章内容最长，字数最多的为《谭之十六》，共552字，主要讲述了有关书法之书的内容，而内容最短且字数最少的是《谭之二十四》，共65字，讲了在书作时时下的状态，只有书家在当时才能感受的到，后人所学并不能及。同时，文章从《谭之一》到《谭之十三》都是关于书体的论述，占了全文内容的三分之一，与中国传统文字演变过程时基本一致的；《谭之十四》到《谭之三十》介绍了学书的基本的要素及书写状态等，最后七条则以朝代顺序介绍了当时最著名的书家或是书论内容。文章中书论的论述并不只是一家之言，涉及到例如《谭之十六》叙述了抽象的书法理论，《谭之二十二》提及了具体的执笔方法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城户桓所参考和见过的中国书法理论内容十分广泛，该书论可以称得上在当时书论水平之上。由此可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中国书法影响的不仅仅是上层的书法人群，在没有名气的书家群体中也影响深远，本文截取城户桓《书谭》中有关篆书的部分来看中国篆书书法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及其影响。

表3 《书谭》内容关键词及字数一览表

序号	内容关键词	字数	序号	内容关键词	字数
谭之一	古文、奇字	446	谭之二十	文房	375
谭之二	大篆（籀文）	130	谭之二十一	虚神净虑（书写状态）	157
谭之三	款识篆	84	谭之二十二	执笔	92
谭之四	小篆	287	谭之二十三	章法	118
谭之五	摹印篆（缪篆）	215	谭之二十四	风神气象（时下状态）	65
谭之六	鸟虫龙蛇等篆	273	谭之二十五	书写效果	138
谭之七	隶书（佐书）	292	谭之二十六	书法传授谱系	118
谭之八	八分（汉隶）	204	谭之二十七	镌刻	123
谭之九	行书	92	谭之二十八	品第	232
谭之十	草书	286	谭之二十九	章草	116
谭之十一	楷书	100	谭之三十	临摹	132
谭之十二	梵书	437	谭之三十一	唐代李阳冰篆书	98
谭之十三	飞白书	324	谭之三十二	唐代张旭草书	261
谭之十四	六书	182	谭之三十三	唐代孙过庭书论	166
谭之十五	古籀	213	谭之三十四	宋代苏、黄、米论书	257
谭之十六	书法之书	552	谭之三十五	唐代鼎钟文传宋	80
谭之十七	帖	183	谭之三十六	元、明书家	112
谭之十八	纸墨效果	139	谭之三十七	书与诗	140
谭之十九	影书（响搨）	83			

注：粗体字书篆书相关的书论

古书犹今书，今书犹古书，象有淳醜，体有文质，而出于自然，贯于一揆，孰知千里之差于毫厘

9) 西川宁编，《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

耶。古今诗也，因革变也，推时处变，百世可知，故登高者观远也矣，迈古者知明矣，加之以研精，申之以岁月，服而不厌，虽不中不远矣，人亦有言百而千之，恍焉有会虽则云而，鲍师之子不觉臭焉，白沙入淄不染而黑，苟滞未途而不见上方，则终身劳悴陷于魔境，故该古今之书，察因革之际，得诸心而应于手，怪马之就于坦途不啻也，此二端者难易之所由而邪正之所分焉，谭之不可以已也。¹⁰⁾

上述文字是城户桓《书谭》的序言，论述了古今书论会在时代的变革与流传中发生变化，会加入时下人的想法和认识，如此而已，这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因此就要辩证的去看待古今书论，理智的进行分析，而不是一味地盲从，《书谭》就是要在在此基础上论述书法理论。

如表3可以大致看出，共有九条涉及到篆书，分别为《谭之一》、《谭之二》、《谭之三》、《谭之四》、《谭之五》、《谭之六》和《谭之三十一》，接下来逐一对此进行分析。

谭之一

古文科斗也，仓颉创之，而不详颉何时之人，《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品以察，盖取诸夬。颉之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孳乳而浸多也，所谓六义纲之，书诸竹帛谓之书，书着也。其章至夏殷或不一律，周监于二代，无所不合，始可得而写也，盖自仓颉至史籀，通谓之古文，及王愔作《文字志》，以科斗古文为二种，其意以仓颉之字为古文，以三代之字为科斗，余按不然，古文者从今指古称耳，《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可见焉，孔安国因形称科斗，后遂有正俗，其正即阙里之漆书，其俗即巧象虾蟆子者也。王氏眩于此乎，按卫恒《四体篇》云，汉世秘藏孔壁之古文，至魏初传之者出邯郸淳，淳之石经之后转使其法，因科斗之名，遂巧效其形。晋人之言犹若斯矣，奇字者古文而异者也，汉刘棻从杨雄所学，而王莽居摄，使甄酈定六书部，一曰古文，二曰奇字是也，张怀瓘《书断》，以石鼓文为奇字，又以为籀文，是亦不然，奇者不解文义，称石鼓岂尽可奇哉，籀文盖大篆之别称，故《说文》所载，其义皆明矣，张氏又云，史籀作大篆，又作籀文，如果然乎，古人何不谓籀文奇字，谓古文奇字哉，夫字本于文，文本于形，事与意各有所合，未初有奇，一涉讹脱则有此称耳，故奇字若得其解即复古文，张氏之说不可从矣。¹¹⁾

这是《书谭》的第一条，这段文字主要论述了古文、奇字等篆书成熟之前的文字，有别于同时期书论直接摘录中国古代书论的是，城户桓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完全引用的文字并不多，在开头部分有完整的两处，一处是“《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品以察，盖取诸夬。”这句话来摘自《周易》¹²⁾，还有一处是“颉之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孳乳而浸多也，所谓六义纲之，书诸竹帛谓之书，书着也，”这句话大体上节录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一些语句进行了精简：

10)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3页。

11)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3-174页。

12) 卜商，《周易》，《子夏易传》，《钦定四库全书》第7册，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08页。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¹³⁾

城户桓在理解的基础上修改了这句话，紧接着引用了唐代郑滑节度贾耽所述的《说文解字源序》中的短句“盖自仓颉至史籀，通谓之古文”，原文如下：

庖牺氏观鸟兽之文，篆形指事作书契以代结，降及夏殷周通谓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着大篆十五篇，古文小异，七国分裂，篆与古文随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内，丞相李斯作仓颉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并约籀文而篆体转工，即世谓之小篆。¹⁴⁾

认为从仓颉到史籀的文字都成为古文，然后城户桓还提及了王愔的《文字志》，《文字志》认为科斗和古文为两种，仓颉之字为古文，三代之字为科斗，城户桓否定了这种说法，而认为可以从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古文孝经》看出，因为字形而被称为科斗；按卫恒《四体篇》所说，汉代将孔壁中所藏的称为古文，魏初传出自邯郸淳，之后立《三体石经》，淳法失传，以其形状而命名为科斗；晋人所说奇字与古文是不同的，汉王莽居摄，甄酈定六书，一是古文，二是奇字，而张怀瓘《书断》认为石鼓文是奇字，又称作籀文，但城户桓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奇”是并不能用文辞解释的，石鼓文更不能完全表现“奇”，籀文是大篆的别称，《说文》所记载的意思是很明了的，张怀瓘也称史籀作大篆，又作籀文，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古人为什么不称籀文奇字，古文奇字呢，事与意各有所合，这样是误称，要想得到奇字的正解就要先上溯到古文，张怀瓘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

城户桓通过对各朝代书家学者的书论进行分析和比对之后，认为古文即科斗，时仓颉创造的，否定了王愔《文字志》中古文和科斗是两种不同文字的说法，之后有理有据的推翻张怀瓘《书断》中对于奇字的说法，认为奇字并不能单纯用石鼓文来替代，要追溯历史，还原古文，从而得到奇字的正解。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代文献又一定的掌握和钻研，并没有像当时其他书论一样单纯只是通过摘录和节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江户时代的书论中是罕见的。透过这段文字可以大致看出城户桓在撰文时可能看到和参考的中国文献资料，整理如表4：

13) 许慎，《说文解字》，《钦定四库全书》第223册，卷十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369-371页。

14) 陈思，《说文解字源序》，《书苑菁华》，《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61-162页。

表4 《谭之一》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周	卜商	《子夏易传》
2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
3	春秋战国	孔子	《论语》
4	宋	陈思	《书苑菁华》
5	北朝	王愔	《文字志》
6	西汉	孔安国	《古文尚书》
7	西汉	孔安国	《古文孝经》
8	西晋	卫恒	《四体书势》
9	唐	张怀瓘	《书断》

谭之二

大篆，籀文也，篆传也，言使之传久远也，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与古文大同而小异也，石鼓十章即籀之所书，宣王之猎碣，或云秦穆公之文也，虽无定据，要词藻之古，非秦后之物，累代剥落之余，小大正欹，而存其篇章，所摹传三百余言，后世以为大篆之典模，然近世所出之篆韵等，以屈曲填密文为大篆，凡屈密者摹印篆也，说详摹印中。¹⁵⁾

这段文字中，“石鼓十章即籀之所书，宣王之猎碣”引用了王厚之的《复斋碑录》，其余都是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大篆即籀文，传播久远，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与古文大同小异，石鼓文的十章即籀文所写，是宣王时期的石鼓文还是秦穆公时期的，虽说还没有定据，但依据文辞可以判断并不是出现在秦后，世代摹刻剥落，文字错落有致，全篇都流传下来，有三百余言，是后世大篆的典范，而对于近世所出的篆韵等，划分大篆的标准就有所出入，但文辞中能看出城户桓对于传统定义的认可。

谭之三

款识篆，列国时之字也，后世得诸金物，因以为称盖款识，本阴镂阳彫之称也，《郊祀志》曰：羨阳得鼎，献之，有司议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故事，张敞好古文，按鼎铭勒而上议云，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宗庙是也。¹⁶⁾

《谭之三》叙述了款识篆，是列国时的文字，阴镂阳彫而成，因为在当时称作盖款识，所盖文字就被称作款识篆，该段的最后两句截取整理了汉代班固《汉书》中的《郊祀志》下的一段内容：

是时，羡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豳，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厩梁，文武兴于酆镐。由此言之，则厩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厩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

15)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4页。

16)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4页。

臣：“官此枸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昔宝鼎之出于汾睢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嗛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臧与？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睢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¹⁷⁾

截取内容是对《郊祀志》中一段文字删减，用最简短的语言复述了这一段话的中心思想，删去了中间不必要的对话内容，阐述了当时款识篆多勒于鼎上，受到人们的良好，但有时也因为款识的内容等因素难荐见于宗庙，由此可以知道当时款识篆的用途及地位等。

通过对《谭之二》、《谭之三》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城户桓在撰写这篇书论时可能参考的中国文献资料如表5所示：

表5 《谭之二》、《谭之三》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南宋	王厚之	《复斋碑录》
2	东汉	班固	《汉书》

谭之四

小篆秦李斯所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峯山》、《泰山碑》，即斯之所书，藏奸精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以执古今之中，野火煨烬之后，摹传者仅二十余字，大为世重焉，《宣和书谱》云：人皆谓李斯为小篆之祖，然以秦穆公时诅楚文考之，则字形直是小篆，而人未之为宗师独李斯擅其名。余按诅楚文本非先秦之文，巫咸、大沈久、湫 駝三种，皆后秦之所伪作，《学古篇》辨之详矣，夫李斯劝始皇焚诗书，至其刻石文乃本诗书，改制文字，使天下同文，而因革之迹，乃百世可知，又世有钱谱，伪附葛天氏金币，黄帝刀布，其文亦小篆，按管子云，夏商之世，珠玉上币，黄金中币，刀布下币，又平准书云，夏殷币金为三等，刀布居其一，盖始称刀布也，故班固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且上古以贝物为宝，故货财字皆以贝不俟辨可知焉。¹⁸⁾

这段文字主要论述了小篆，认为是秦李斯所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¹⁹⁾这句话摘自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小篆取于史籀的大篆，是对其进行的省改，《峯山》、《泰山碑》就是李斯所写。“藏奸精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以执古今之中，野火煨烬之后，摹传者仅二十余字，大为世重焉”这句话则是对明代赵宦光《论九体书》第四句的整理，原句如下：

四曰小篆，秦斯为古今宗匠，一点架度不苟，聿遭聿转，冠冕浑成，藏奸婧于朴茂，寄权巧于端

17) 班固，《郊祀志》下，《汉书》，《钦定四库全书》第249册，卷二十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91-607页。

18)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4-175页。

19) 许慎，《说文解字》，《钦定四库全书》第223册，卷十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369-371页。

庄，乍密乍疎，或隱或显，负抱向背，頽仰窳承，任其所之莫不中律大，敦而圜小，柔而方，书法至此无以加矣，唐李阳冰得大之圜而弱于骨，得小之柔而缓于筋，后世莫不由此而出，各就偏长，别立门户，及野火煨烬之后，《泰山》、《峯碑》可拓者二十余字，世有徐铉摹本，而先秦之文仅存百一矣，反为所掩也。²⁰⁾

城户桓看似十分赞同赵宦光的观点，小篆在秦李斯省改之后，遵循其规律特点，经过历史的流传，只有二十余字，但是小篆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城户桓还对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夏秋间，由内臣奉徽宗之命而编纂的历代书法作品评汇编《宣和书谱》卷二的篆书叙论进行汇总：

篆书者，从来远矣。其古文科斗之书，已见于鼎彝金石之传，期间多以形象为之，而文彩未血也。自上而下，文科斗之法发达而后世易以大篆，实出史籀也。籀在周宣王时为太史氏其书，今之所存者，石鼓是也。以其籀之所创，故名之曰籀书，以其为太史氏而得名，故又谓之曰史书。若夫小篆则又出于大篆之法，改省其笔画而为之。其为小篆之祖，实为李斯始。然以秦穆公时，诅楚文考之则字形真，是小篆，疑小篆已见于往古而人未之宗师，而独李斯擅有其名。²¹⁾

城户桓将这段文字总结为两句话：“人皆谓李斯为小篆之祖，然以秦穆公时诅楚文考之，则字形直，是小篆，而人未之为宗师独李斯擅其名”，人们都将李斯奉为小篆之祖，然而以秦穆公时的诅楚文进行考究，字形真为小篆，追根溯源并未见宗师，唯独李斯可以胜任这一名号，城户桓则认为诅楚文不是先秦的文字，巫咸、大沈久，湫 驼这三种，都为后秦所伪作，在吾衍《学古编》中有详细的解释：

《诅楚文》（俗呼《诅楚文》，李斯篆，在凤翔府）。有巫咸、大沈文（音故）、湫（音夸）驼三种，辞则一。乃后人假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较其篆，全不相类，其伪明矣。篆文“皇”，本从“自”，世传始皇谓与臯臭相似，因去一画。不足为病，在前亦有如此者。《峯山》数、成等字，皆与古异，此碑用之，及用《秦权毆》字作也。盖知见《峯山》、《秦权》而后创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峯山用此法。诚古也，其如辨者何？²²⁾

城户桓对吾衍这一解释较为认可，当时李斯劝秦始皇焚诗书，将其自己刻写的文字定为范本，使得天下同文，然而当时有钱谱，金币、刀布上的文字也是小篆，管子曾按：

五币，黄帝立

珠玉上币，黄金中币，刀布下币，管子上中下为三币，玉币七筭。管子对威公，此谓以少为多，

20) 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钦定四库全书》第8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273页。

21) 《篆书叙论》，《宣和书谱》卷二，《钦定四库全书》第8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214-215页。

22) 吾衍，《碑刻品九则》，《学古编》，《钦定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846页。

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矣。²³⁾

称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司马迁的《史记 平准书》中提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²⁴⁾ 城户桓从中凝练出一句话：“夏殷币金为三等，刀布居其一，盖始称刀布也”，很简洁的概括了《史记》中刀币的大致含义，而《平准书》作为《史记》的八书之一，对班固《汉书》中《食货志》的撰写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食货志》中记载：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²⁵⁾

节录了第一句话的内容，金钱布帛的用处夏殷之前就有详细的记载，同时上古时期将贝类当作宝物，因此被视为财货的贝类上的文字，很容易辨别出来，城户桓认为小篆除了是被誉为小篆之祖的李斯所改订的文字之外，当时有存世的钱谱，金币刀布上的文字也是小篆，并通过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考证，不拘泥于传统书论和记载，从历史的方面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该段可能参考的文献资料整理如表6：

表6 《谭之四》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
2	明	赵宦光	《论九体书》
3	宋	佚名	《宣和书谱》
4	元	吾衍	《学古编》
5	清	宫梦仁	《读书纪数略》
6	西汉	司马迁	《史记》
7	东汉	班固	《汉书》

谭之五

摹印篆即缪篆，秦汉异其称耳，吾衍误谓汉有摹印篆，如篆如隶，后人不知古印，妄以屈曲填密者为摹印篆，又云缪篆，小篆而弱者，如李阳冰非也，吾氏独识押印式而不知佩印式，按《汉书》《说文》并云，秦曰摹印篆，汉曰缪篆，颜师古、徐锴并云，其文屈曲填密，即秦玺文也，可见焉，又按官者佩印咸铸物，纽饰因尊卑各有品，其文亦屈密，目之为信也，故印面之文左向，汉文有押印，咸

23) 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卷三十七，人部，《钦定四库全书》第10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52页。

24) 司马迁，《平准书》，《史记》，卷三十，八书第八，《钦定四库全书》第2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660-672页。

25) 班固，《食货志》，《汉书》，《钦定四库全书》第249册，卷十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46-565页。

彫物，纽饰从其所好，其文篆隶杂法，任字而略章，以擅其美，以朱押于诏奏私文，亦以为信也，故印面之文右向，刀笔如之，遂以为式，且夫缪亦绸缪屈曲之义，岂小篆而弱者哉。²⁶⁾

这段叙述的是摹印篆，也即缪篆，秦和汉对此的称呼不同，吾衍误称汉代有摹印篆，后人不知道有古印，盲目的将屈曲填密的称为摹印篆，同时还认为吾衍所说的只有“押印式”是不合理的，应该还有“佩印式”，这两句话来源于对吾衍《学古编》中《三十五举》的第十八举和第十九举的理解，原文如下：

十八举曰：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王球《啸堂集古录》所载古印，正与相合。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颜鲁公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

十九举曰：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²⁷⁾

城户桓大胆的对古人提出质疑，并没有盲目的遵循中国传统书论，在质疑的同时用更有说服力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中在质疑吾衍的同时提到，《汉书》和《说文》有记载秦代时称为摹印篆，汉代时称为缪篆，颜师古与徐锴也曾说文字屈曲填密，称作秦玺文，同时还称当时官者佩戴印章，纽饰也因身份的尊卑而有所区别，上面文字也屈曲填密，印面文字向左；汉代印章，吊饰，纽饰都依据个人的喜好，文字风格篆隶杂糅，以朱印押于奏折诏书之上，印面向右，缪有绸缪屈曲的意思，这段解释中目前并没有完全对应的中国文献，最接近的一句是清代桂馥的《晚学集》中《缪篆分韵序》的描述：

秦书八体，五曰摹印，徐锴曰：摹印屈曲填密，秦玺文也，汉曰缪篆，颜师古曰：缪篆谓其文屈曲，绕所以摹印章也。

除此之外看颜师古与徐锴出现频率最高的文献书籍为《汉书》和《史记》，因此推测《谭之五》在撰写时城户桓可能参考过的中国文献资料如表7：

表7 《谭之五》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元	吾衍	《学古编》
2	东汉	班固	《汉书》
3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
4	清	桂馥	《晚学集》
5	西汉	司马迁	《史记》

26)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5页。

27) 吾衍，《三十五举》，《学古编》，《钦定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843页。

谭之六

鸟虫龙蛇等之篆，其目存而其字不存，汉末蔡邕闻六篆之目，而识二篆之字，后索靖所目二十于种始有异闻，及王愔三十六种，而愔云，见其目未见其书，又庾元威之目者三百余种，王南取而更增六十余种，今见其字流之一端，不啻所谓丁谓之怪，古因脚引垂者，今因垂引脚，锐而为悬针，坠而为垂露，纵者柳叶，收者倒口，钝则科斗，折则蝌虫芝英蹲墨，飞白枯笔，煨象鸟兽，慢形草木，遂亏工于翰墨，争能于舟青，莫知其所由师，许慎有言，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假使许氏见此数者，其以如何，夫书王者之所制，而通于四海达于古今，故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古者，文字疑则阙之，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此怪物，翰墨之异端，书艺之大厄。²⁸⁾

《谭之六》主要论述了鸟虫龙蛇等篆，认为流传下来有名称，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字，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提及了汉末蔡邕，之后的索靖、王愔、庾元威、王南取等人对于这类篆书的分类，然后对赵宦光的《论九体书》的第六部分进行了整理：

六曰奇篆，采择杂体，就简避烦，趋逸去拙，其本来之形与夫累代之制，皆不泥也，格借玉筋，体间碧落，情杂钟鼎，势分八分黠画以大为宗，波折以真草托迹，规矩准绳终束于斯，昔之文字因脚引垂，今此奇篆，因垂引脚，书法之变，此大谬也，所尚者简洁飞动，妍态取容，举世尚奇，去假取此，从兹而降，好古之士，锐其垂而为悬针，垂露纵其垂而为柳叶，收其垂而为倒籀，顿而为蝌斗，折而为蝌虫，蹲墨为芝英，枯笔为飞白，龙蛇云鸟转宿，偃波此其滥觞也，而莫知其所由师，昔存其名迹，则莫考效颦臆说书法外道，翰墨之厄。²⁹⁾

这是这篇文章中第二次截取赵宦光的《论九体书》，将文章内容理解后转述为自己的语言，叙述了一系列如悬针、垂露、飞白、顿、折等笔法及名称之后，但不知其所出，许慎也称这些是虚造之书，假如许慎见过以上篆法，那必将流传于世，所以说是由于秦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有些文字被移除，是历史的缺失，书法的遗憾，对秦始皇统一文字提出批评，认为这一制度抑制了书法全面的发展和一些文字的流传。针对以上文字，整理出城户桓有可能参考的文献书目如表8：

表8 《谭之六》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明	赵宦光	《论九体书》
2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
3	东汉	班固	《汉书》

28)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75-176页。

29) 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钦定四库全书》第8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274页。

谭之三十一

汉而后传文绝品者，独以唐李阳冰为其人也，自谓李斯后一人也，人不以矜，是以有二李之号，至其字形，或有异法，吾衍云，本于崔子玉，阳冰之侄腾，亦不乏家声，世有腾说文字原帖，宋始徐铉以篆文名于时，古形犹存，后趋妍巧，而二李之法殆亡矣。³⁰⁾

《谭之三十一》主要讲了唐代篆书家李阳冰，汉代以后篆书逐渐衰落，到唐代李阳冰，自称为李斯之后一人也，对李阳冰的评价问题，本人在《唐代书家李阳冰篆书书法的复兴及其影响》³¹⁾中有详细的论述，关于李阳冰这一自称的说法有很多记载，如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

李阳冰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³²⁾

中国书法史上对李阳冰的评价褒奖居多，但也有贬斥，城户桓在文中就对李阳冰进行了批驳，认为李阳冰“自谓李斯之后一人也”并不谦虚，历史上是有李斯、阳冰“二李”之称，但是字形有所异同，同时借用吾衍的《学古编》所云：

李阳冰《新泉铭》（阳冰，赵郡人，将作少监）。乃阳冰最佳者，人多以舒原舆之言称《新驿记》。殊不知，此碑胜百倍也。阳冰名潮，杜甫甥也。后以字行，因以为名，而别字少温。《木玄虚海赋》有云：“其下阳冰不治，阴火潜然。”则知与潮，又且有理。人多不知，因详其说。又有李腾，善伪作阳冰书。³³⁾

不应一概而论认为李斯之后只有李阳冰，阳冰的侄子李腾擅长伪作李阳冰篆书，有可能传世之作并不是阳冰所作，到了宋代徐铉因篆书名于一时，古风犹存，但已经有所改变，“二李”之法也就消失殆尽了。这段文字内容虽短小，但可以看出参考了许多中国古代文献，如表9：

表9 《谭之三十一》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清	康有为	《广艺舟双辑》
2	元	吾衍	《学古编》

2、清代篆书书法在江户日本的接受情况分析

通过上述对《书谭》有关篆书的部分分析之后发现，城户桓在日本书法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历

30) 城户桓，《书谭》，《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2月，第185页。

31) 曹悦，《唐代书家李阳冰篆书书法的复兴及其影响》，《或问》，第二十八号，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2015年12月，第169-176页。

32) 康有为，《广艺舟双辑》，

33) 吾衍，《石碑刻品九则》，《学古编》，《钦定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846页。

史上的记载也很少，但《书谭》这篇书论有别于同时代的书论内容，并没有直接摘录中国古代书论，而是通过对中国文献的理解之后进行论述，对于一些理论提出质疑并考证，使用了大量的中国文献资料，当时在撰文时可能参考到的书目在上一节中已进行整理，即表3到表9，将这些书目汇总起来如表10：

表10 《书谭》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一览（按文章内出现的先后顺序）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周	卜商	《子夏易传》
2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
3	春秋战国	孔子	《论语》
4	宋	陈思	《书苑菁华》
5	北朝	王愔	《文字志》
6	西汉	孔安国	《古文尚书》
7	西汉	孔安国	《古文孝经》
8	西晋	卫恒	《四体书势》
9	唐	张怀瓘	《书断》
10	南宋	王厚之	《复斋碑录》
11	东汉	班固	《汉书》
12	明	赵宦光	《论九体书》
13	宋	佚名	《宣和书谱》
14	元	吾衍	《学古编》
15	清	宫梦仁	《读书纪数略》
16	西汉	司马迁	《史记》
17	清	桂馥	《晚学集》
18	清	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以上表10所罗列的是城户桓在撰文时可能参考到的书目，结合《书谭》的成书时间，即宝历六年（1756年），在此之前随唐船传入日本的书籍可能有如表11：

表11 《书谭》中涉及到的中国文献书目随唐船舶入日本的情况

序号	作者	书名	版本	输入日本的时间	西历
1	卜商	《子夏易传》	单行本	享保十年	1725
2	许慎	《说文解字》	单行本	正德四年	1714
				享保十二年	1727
3	卫恒	《四体书势》	说郭本	享保四年	1719
				宽延四年	1751
4	张怀瓘	《书断》	百川学海本	宝永七年	1710
				宽延四年	1751
			说郭本	宝历四年	1754
				享保四年	1719
5	班固	《汉书》	单行本	宽延四年	1751
				正德四年	1714
6	吾衍	《学古编》	说郭本	享保四年	1719
				宽延四年	1751

7	司马迁	《史记》	单行本	宝永七年	1710
				正德四年	1714
				享保十年	1725
				享保二十年	1735

通过比对之后发现，城户桓可能参考的资料如表11，可能性最大的有5本，分别是：《子夏易传》、《说文解字》、《汉书》、《史记》、《说郛》，而其他书目，如《寒山帚谈》等一些参考可能性大的书目在唐船持渡书中没有记载，但有可能在江户时代之前就已经传到日本并为人们所学习。

四、小结

中国书法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定文字，篆书即作为当时中国普遍通用的书体，并逐渐形成完备的体系，之后，随着文字的演变和实用性的需要，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标准字体，到后来演变为楷书、草书，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书，在关注实用性的同时，共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日本，由于航海、贸易、佛教等一系列因素，中国书法随之传入日本，最开始盛行的是六朝书风，之后的唐代，对日本书法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六朝、唐代的楷书在日本风靡，并被普遍接受，然而当时的日本对于篆书书法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在文字演变、书法发展这一过程中，随着新书体的产生以及实用性的增强，作为书法发展源头的篆书逐渐衰弱，一直到唐代李阳冰才得以复兴，随后又走向低谷，直到清代，篆书的地位及影响重新确立，也广泛传播到日本，除了一些如松下乌石、泽田东江等有名的书家以外，城户桓等一些鲜有人知的学书者可能也受到这股篆书复兴风潮的影响。³⁴⁾

通过分析，以当时较有名的书家为例，松下乌石撰写《书法群碎》参考了《书断》和《书史会要》的内容，而这两篇文章出自《百川学海》，因此这部书参考的可能性最大。泽田东江的《篆说》结合北川博邦的题解，参考《说文解字》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在逐句分析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法书要录》、《墨池编》、《佩文斋书画谱》，也有很大参考的可能性。除了对有名书家书论的分析，不太有名的城户桓的书论《书谭》有别与前两者的是，参考的书目较多，可能性最大的是《子夏易传》、《说文解字》、《汉书》、《史记》、《说郛》，还有如《寒山帚谈》等在江户时代之前就传入日本的书籍，与松下乌石、泽田东江相比，城户桓对书法内容涉猎广泛，参考的图书较为丰富，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摘录极少，大部分内容都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同时大胆的对古人提出批评，并通过考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中还涉及到许多前人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例如一些仅存名目但并没有真迹流传的书体，对李阳冰等的认识等等，可以看出城户桓看待问题较为客观，并不盲从，遵循古法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虽然历史上对其记载较少，但是通过对中国篆书书法理论的学习，为日本篆书书法的流传、发展和普及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34)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日本——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东亚海洋共同体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主办，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承办，2015年12月，第22-39页。